

·蒲松龄生平思想研究·

文章编号 :1002-3712(2009)01-0005-09

被夸大的“历史的同情”： 蒲松龄的科举考试观念研究

——以《聊斋志异》的文本分析为例

李 力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聊斋志异》对于了解蒲松龄的科举考试思想和观念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 ,特别是通过对众多篇目中关于时文(八股文)的描写和议论进行分析和考察 ,可以发现蒲氏对于以八股取士为代表的科举考试制度 ,并非文本表现和读者想象的激烈和决绝 ,而是依旧保持着对时文的欣赏 ,以及暗含着希望不断地通过对时文的研究和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得以致仕。作为阅读和评论者的大众似乎有“替古人担忧”之虞 ,即过分地将对于蒲氏的“历史的同情”放大 ,以至于在理解上脱离蒲氏的个人语境 ,从而单方面的拔高了其对科举和时文的憎恶和仇视 ,与此同时也不自觉地淡化了作者本人对于科举的真实态度 ,最终形成了大众有选择和宽容的科举考试观念。

关键词 :蒲松龄 聊斋志异 科举 ;八股 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08-10-07

作者简介 :李力(1982-) ,男 ,陕西西乡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和考试制度研究。

自明代开始实行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形式,以朱熹所注的《四书》和《五经》为唯一参考内容和答案来源的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无论是科举的形式还是内容都逐渐受到了严格的桎梏,这种情况至清代愈演愈烈,最终积重难返,导致科举考试制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强行废止。在这种背景之下,自明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批判和针砭科举考试时弊的显著人物,其中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恐怕莫过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其笔下的作品常以激烈地抨击社会弊端之黑暗和丑陋而著称,终身因困顿场屋而不得志的蒲氏将长期目睹耳闻的存在于科举考试中的贿赂成风、徇私舞弊等现象幻化为离奇虚幻、光怪陆离的场景和情节,以泄其愤懑之情。于是,借助出色的文笔和后世各种途径的传播和解读,蒲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反科举斗士,其思想也俨然成为了激进和锋利的代名词。可以说,大众有关科举考试的许多概念和印象都受诸如《聊斋志异》这样古典小说的影响至深。

一、蒲氏的真实观念:词赋文章,华国之具也

蒲氏真实的科举考试观念究竟是否与大众所了解到的相契合呢?通观《聊斋志异》可以发现,蒲松龄在自己的大多数文章写就之后,都会以“异史氏”的身份对其文章的主题或中心思想发表一番简短的评论,这实际上是作者在借“异史氏”之口为自己代言,从而发表真正自己欲言之言,最终达到寓教于文的结果。考察《聊斋志异》中许多涉及科举考试的篇什大都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故事发生的场景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科举考试,进而展开各自故事情节;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赶考或从事举业的士子等等,而其中最能体现蒲氏对科举考试的真实态度的,就是他在不同文章中对时文也就是八股文的描述和评价。如果将其在书中不同章节所表达的八股文观念详细分析并加以对比的话,便会发现许多不易为人所觉察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廓清我们已有的诸多蒲

松龄关于科举考试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时文(即八股文)是从事举业的士人所必须精熟的,也是关系士人前途和命运最为密切的,蒲氏自然也不例外,其对于时文的批判通常也是较为猛烈的,主要体现在《叶生》、《考弊司》、《司文郎》和《三生》等几篇文章之中。

《司文郎》是《聊斋志异》中比较集中地反映科举考试问题的一篇作品。描写的是山西平阳府的王平子在前往参加顺天府乡试的途中,结识了同行的余杭生和宋生,以及随后发生在考前和考后的一系列事件。在篇中,蒲氏设置了一幕“瞽(盲)僧焚文嗅高下”的精彩场景。这个瞽僧以前也曾经是写作八股的斫轮老手,后来因为“抛弃字纸过多,罚作瞽”,当他嗅到余杭生之文时,

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自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1](P124)}(《司文郎》)

而第二次再闻余杭生的老师也就是考官之文时,

僧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1](P125)}(《司文郎》)

蒲氏的情节设计和描写可谓是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便会发现,蒲氏借瞽僧之口表达的仅仅是对劣质时文的厌弃,而并非针对时文本身。也就是说因为余杭生和其师的时文水平实在低劣,连眼睛失明的人闻见其味也不得不向壁作呕。但是对于高质量的时文,蒲氏非但不嘲弄,反而还要借助瞽僧之口加以赞叹,表示欣赏。余杭生为了试探瞽僧是否真正能够通过嗅觉去感知文章的优劣高下,故意焚烧了以前有名的时文大家的作品以探虚实,

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己作。^{[1](P124)}(《司文郎》)

此处的归和胡分别指的是归有光和胡有信,他们都是明代的著名

文人,同时也是八股大家。当警僧闻到的是以清真雅正而著称的八股大家的文章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我心受之”的欣赏和愉悦,丝毫没有半点的厌恶之情。

《三生》一文讲述的是湖南的一个人可以回忆起自己前三世的经历。他“一世为令尹,闹场入帘,”结果黜落了当地的一个叫做兴于唐的名士,导致其“愤懑而卒”。当此人的阴魂向阎罗递送讼状之后,阴曹地府中数以万计的读书应考者的冤魂都群起而响应,一致要求阎罗挖去这个知县的双目以泄怨气,结果被阎罗拒绝,而阎罗的理由则十分的耐人寻味,

阎罗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见鄙耳。”^{[1](P140)}(《三生》)

原文的意思是说,不是这个知县不想发现优秀的文章,只不过他的眼力太差而已。这里的“其所见鄙耳”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可以解释为并非考官不想发现优秀的文章,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眼力太差,没有能力和水平去发现,原因主要归结为主考官的颞颥。第二种则可以解释为,主考官本身并没有过错,只不过没有好的时文涌现出来罢了,原因主要归结为士子自身。但是无论上述哪种解释,都丝毫没有将原因归结为时文之咎,这也可以表明蒲氏对时文的态度。甚至当书中的主人公屡试不中时,蒲氏也未曾对在他看来是“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1](P105)}(《叶生》)的时文表现出丝毫不快,相反更多的是归咎于“时数限人,文章增命。”^{[1](P103)}(《叶生》)这种对命的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试摘抄数语如下:

公一日谓生曰:“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生曰:“是殆有命!”^{[1](P104)}(《叶生》)

僧笑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1](P124)}(《司文郎》)

宋慰王曰:“……当前蹶(cu)落,固是数之不偶。……”^{[1](P125)}(《司文郎》)

简而言之,蒲氏对于时文的真实态度,其实就是“天下事,入之深者,当其无有,有之用。词赋文章,华国之具也。”^{[1](P305-306)}(《诗谏》)也就是说,时文本无咎,所责者仅在所如不偶的命运和衡文不公的主考而已!^①

二、被夸大的“历史的同情”貌似激烈,实则温和的八股观念

蒲氏之批科举,貌似激烈有加,实则温和有余。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的印象,细细究来,原因有二。其一,其所批判之着力点实为对人不对事。纵观全书,所涉之关乎科举之公案,最终都归咎于考官等当事人的昏聩无能和考生命运之多舛和不偶,而绝少涉及考试制度本身的利弊;其二,其刻画恐怖血腥的程度之细致和逼真,超过了其对形象和事件本身的说明,以至于读者在沉浸于其绘声绘色的场景描写中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于事件本身的理性思考。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考弊司》和《三生》两篇中,蒲氏将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官员的贪腐刻画得淋漓尽致,极尽能事。

官以出,卷发鲐背,若数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倾,不承其齿。从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余人列侍,半狞恶若山精。……^{[1](P113)}(《考弊司》)

而对于主考官的贪鄙和对待士子的不公方面,也予以逼真的描写:

一狞人持刀来,裸其股,割片肉,可骈三指许。秀才大噪

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出了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其中较明显的就是考生落第究竟应该更多的归咎于主考的颀顽昏庸,还是考生自身的水平所限,抑或是场屋内的命数弄人,仔细考证可以发现,蒲氏自己对此也是即此即彼,所言唯唯,没有明确的答案。例如,他在《司文郎》一文中借用瞽僧之口将原因归咎于考官,“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指考官),并鼻盲矣。’”在《三生》篇中,他又借阎罗之口将原因归咎于考生自己,“阎罗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见鄙耳。’”而他关于命数的抱怨和无奈有散见于其他的很多篇章中。

欲嘎。〔1〕(P114)(《考弊司》)

面对如此不仁的考官,落第而归的失落考生自然而然要把全部的愤怒和怨恨发泄到考官身上,在《三生》一文中,众多考生强烈要求阎罗一定要严惩判卷的主考:

众又请剖其心,阎罗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蠹(离)胸。两人沥血鸣嘶,众始大快。皆曰:“吾辈抑郁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气者,今得兴先生,怨气都消矣!”哄然而散。〔2〕(P140)(《三生》)

这样看似痛快的结局设计在反映蒲氏对于时局的无奈和悲情之外,其实恰恰反映了在蒲氏痛快淋漓的激烈杀伐之下,真正存留的仍是一颗温和有余的心,依旧保持着对于时文的溢美之词和所暗含的希望不断地通过对时文的研究进身的真实观念。

之所以会形成反差如此鲜明的印象,根源在于我们往往在阅读历史文本和理解作者观点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情况,即在已有历史观念制约和指导的影响下,易于过分地同情作者的倾向,表现为读者善于主动替作者去阐发和解释他的观点和态度,进而擅自承担了极易于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而单独解说文本的局面,姑且可以将其称之为被夸大的历史的同情。

陈寅恪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了“历史的同情”这一观点。“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2〕而所谓的“历史的同情”,“其大义有二:于古人所处之环境理解古人,而不是用今人的观点批评古人;于历史史实中求结论,而不是将历史史实填入构建的逻辑系统中。”〔3〕(P9)

反观大众对于《聊斋志异》一书的总体印象和接受程度而言,其书中鬼神形象的具象性远大于教化寓意的隐晦性,故事情节的离奇性要强于其对现实生活的比照性,而单就其中的科举考试而

言,作为阅读和评论者的我们似有“替古人担忧”之虞,即过分地将“历史的同情”放大,以至于在理解上脱离蒲氏的个人语境,从而单方面地帮助蒲氏拔高了其对科举和时文的憎恶和仇视,同时不自觉地淡化了其对于科举的真实态度。通俗地说,就是我们似乎嫌蒲氏批判科举的力度不够,从而积极地再帮助其加深对科举的批判力度。因此,大众普遍所接受的负面印象则更易于使人产生“蒲氏个人的科举体验=一个时代的科举风貌”这样以偏概全的错觉。但是另一方面,蒲氏个人于文本中所渗透出的对时文的肯定乃至期望的这种深层次观念,反而被淹没在了众多所谓对其思想条分缕析般的精致解读和辛辣批判中。即使有评价涉及这种观念的存在,也仅仅是大而化之地以作者自身的阶级性质及其历史局限性一语带过,进而便固定为如此一种万能的评价模式,即蒲松龄的特点=激烈的批判+历史的局限这样简单的二元模式,而大众则又机械地秉持着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其作品及其内涵乃至整个科举制度。至此,可以进一步对普通大众科举考试观念形成的原因做更为大胆的理解,即对于经典思想的单一化和片面化的解读。可以说,大众不仅对于八股文的态度如此,对待科举的看法也不出其外。

三、结语 大众的科举观念具有选择和宽容性

另外,大众的科举考试观念同时也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有选择的、宽容的科举考试观念”。可以先来看这样一个现象:现有对于范进、严监生乃至孔乙己之流等经典科举形象的评价呈现出绝对的嘲讽和批判,而蒲松龄本人从考的时间之长和强度之大则同样为世人所熟知,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前两者,但后世却少有批判关于蒲氏虽数十年不懈参加科举考试,但却始终未中的经历,难道仅仅是因为严监生和孔乙己是虚构的文学形象而蒲氏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吗?难道是因为蒲氏没

有一朝高中而像前两者那样作癫疯状进而窘态毕现吗？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像前者那样在临死前还嗫嚅着暗示家人要熄灭一根灯芯以示其吝啬和迂腐之态吗？非也！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完成了一部《聊斋志异》，从而就导致了他与严、范二人生前的相同经历却完全迥异的身后评价。^①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即大众在评价科举人物并形成对其的基本观念时，起决定因素的并非其参与科举考试本身的客观事实，而是主要根据其在参与科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态度，以及是否与日后大众所处的整个社会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主流的态度相一致，当然，无论这种态度是否为作者真实观念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二者相符则表现出一种宽容的谅解，甚至可以忽略其本身参与科举考试的诸多事实，而这些事实恰恰就是范、严和孔之流长期受责难的原因所在。

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大众之所以会形成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诸如此类的观念，其实是有着历史渊源的。《聊斋志异》一书中诸多的人物和故事原型，在蒲松龄生活的当时以及之前，均有相似的文本记载，甚至有的记载在多个时期都有类似的表现。^②这就说明《聊斋志异》中所反映和表现的，并非单纯蒲氏个人一己的感受和他生活数十年中的所见所闻，而是有着悠长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通过包括文本在内的各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途径一代代的继承和书写，有关科举的片面观念也被一代代的流传广布。一定程度上讲，现在有学者所忧虑的科举被妖魔化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过多地被某些片面解读诸如《聊斋志异》等最为大

①有学者在解释大众为何会形成许多有关科举的负面印象时，曾提及如下原因：“部分是由于受中学教材中的《范进中举》、《孔乙己》等课文的影响，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科举是一种只会造就腐儒的没落的制度，……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根源。”（刘海峰著《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②关于《聊斋志异》书中人物和故事的渊源及其对以后诸多作品的影响，可以参阅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

众所熟知的经典书籍中所反映的有关科举的黑暗腐败的一面,单方面影响所致的结果,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形成了类似古代科场中极黑暗可怖这样典型的观念。最关键的是,正因为这些观念栩栩生动且简单通俗,同时又富于故事传奇性质,从而在民间通过多种途径被大众流布和接受。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4](P151)]这样的说法,而这也从侧面展示了一条一直以来在大众间默默践行着的观念传递途径:古代的科举记录→大众的科举观念,而其中的媒介就是最能影响大众观念的各个时代的大众文化消费品。这条途径看似极为简单,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自己关于科举考试观念来源和形成的话,这确是一直以来在影响我们绝大多数人科举考试观念形成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清)蒲松龄著,张学忠选译.聊斋志异选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J].学衡,1931,(74).
- [3]姜国钧.中国教育周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魏 静)